

我为鲁迅茅盾辩护

秋石◎著



鲁迅何以谓之伟大？何以成为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心目中的民族魂？……

鲁迅生前亲密战友、著名文学大师茅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

蒋介石为什么会说出“我素来很敬仰”鲁迅的话？他又为什么要安排既为自己亲信又为鲁迅门生的李秉中作说客？一再劝说鲁迅（并提供经费）去日本疗养？……

我为鲁迅茅盾辩护

秋 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为鲁迅茅盾辩护 / 秋石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 - 7 - 80741 - 515 - 2

I . 我… II . 秋… III . 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文集 IV .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909 号

我为鲁迅茅盾辩护

作 者 / 秋 石

责任编辑 / 甘 椴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20 千

印 张 / 21.25

印 数 / 1 - 2100

ISBN 978 - 7 - 80741 - 515 - 2

定 价 / 34.00 元

鲁迅传人贾植芳(代序)

2008年4月23日下午6时46分,我的人生暨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静静地走完了他的九十二年的人生道路。

贾植芳先生一生甚是坎坷,但他活得又是那样的正直、顽强和极富人情味。

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他是顶着花岗岩脑袋至死也不承认胡风是向党进攻的反革命而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的两名“骨干分子”之一……

有这么一件事,是一件早已往事如烟微不足道的小事,多年来,却令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贾植芳先生宽广的胸襟。

在1955年胡风案的那场惊天大冤狱中,由于舒芜先生在关键时刻实施反戈一击,悉数交出胡风给他的来信,令胡风及其“反革命同伙”们雪上加霜。舒芜先生纵是这等的“不齿”,但在贾植芳、任敏这对患难夫妻的心中,从来没有忘却舒芜先生当年对他们的真善之举。那是1947年冬,贾植芳先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捕去囚禁。离开安徽老家赴广西寻找工作,途经上海的舒芜先生闻讯后,探望了任敏,并从自己有限的旅费中取出一部分交与任敏。尽管数额不大,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贾植芳任敏夫妇却一直没有忘怀,并将此事写进了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中。任敏去世后,贾植芳先生又将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放入《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一书中。他们的这种实事求是的作为,受到了与之来往的所有人的交口称颂,也为下一代,下下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做



人、如何尊重历史，尽到了一个楷模的作用。

贾植芳先生遭受莫须有冤狱这么多年，要说没有怨愤没有这个那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但在其复出以来的这几十年间，凡是与之有过来往并交谈过的人，从没有见他骂爹骂娘哭天呛地，怨言、愤激之词也甚罕见。在我同他交往的这么多年间，数十次会面晤谈，从没有见过他对共产党、毛泽东指责过一句。他以他高尚的人品，尤其是处处、时时、事事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许多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晚辈。

记得 2000 年岁末，在提请贾植芳先生为我《萧红与萧军》一书修订本《两个倔强的灵魂》作新序时，应我要求，他慨然应诺，特地加入了一段于外人看来“贾先生很难接受”的话。这段话是：

秋石同萧军有着近乎一样的幼年痛苦生活，而在青年时期又频频历经风浪磨砺，有着许多同龄人所没有的传奇性经历。秋石说，他永远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新中国带来的温暖：“至少，在我心中，毛泽东是不可否定的！”在祖国黎明前一年差一点与兄姐一起冻饿夭折的秋石，进入新社会后备受国家照顾，使他免费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秋石出生在鲁迅的故乡，而其出生地距鲁迅故居仅“一箭之遥”，因而，自幼时起，他对鲁迅这位故乡名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充满着深深的敬意。数年后，当他小学刚刚毕业的时候，他便矢志向鲁迅看齐，当一名时时刻刻为时代、为人民鼓与呼的硬骨头作家。

贾植芳先生爱憎分明，对人之谦和、热忱，远近闻名。对此，他的朋友们，他带出的三代弟子都有专文撰述，我不再复述。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与他交往九年来他对我的全力扶持。在这方面，我体会尤深：像鲁迅一样善待有进取心的后生，尤是学界新人。

我只有高中文化，从没进过大学，也没接受过一天半日的文艺理论培训，“似一匹野马不守规则地闯了进来”（贾植芳戏谑之语）。

记得是在 1999 年的 10 月，在《文汇报》两位报人的引见下，我第一次来到了位于国顺路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贾植芳先生家中。当时，我撰写的带有大量史料见证的《萧红与萧军》一书付印在即，极盼有一位三十年代左翼前辈为之作序。就这样，在两位报人的引荐下，我与贾植芳先生有了来往。不出一个月，他在阅读完我带去的近十万字资料后，为拙著作了一个分量颇



重的序。次年三月,《文艺报》在北京为拙著召开的研讨会,其宗旨正是贾植芳先生在其序中强调的一个核心: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自那时起到现在,他的这句话成为了我的座右铭。自1979年8月我与萧军在哈尔滨以“不打不相识”的方式交往始,先后结识了与萧军同一时期的左翼作家近二十位,他们对我的创作和研究注入了活力。而我在学术领域的真正进步,乃是与贾植芳先生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那句话,将影响我的后半生。

《萧红与萧军》一书出版后,仅四个月,就在上海脱销,不出半年,首印3000册即告售罄。八个月后又再版3000册。取得这么好的销售业绩,不能不说这是与贾植芳先生所撰的序有很大关系。而也正是贾植芳先生震聋发聩的“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这句话,使我感受到了其沉重无比的压力。一年后,根据贾植芳先生和研讨会上众多学者、专家的中肯意见,我对《萧红与萧军》一书作了较为完整的修订,同时也检讨了自己过于站在自己所熟识的传主一边,原著中对端木蕻良、周扬等前辈不恰当的指责,以及不应有的“扬军抑红”的倾向——这些,都在一年后于作家出版社的全新修订本《两个倔强的灵魂》中作了纠正。

记得是在2000年3月间,贾植芳先生嘱我给他“几本书”。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送给韩国和日本的年轻学者。听了这话,犹如冬日里的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他这话,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萧军满含激情同我谈及的一件事:那是在《八月的乡村》出版后,鲁迅亲将其一一推荐(寄)给多国学者、作家的事。从贾植芳先生的身上,我见诸了当年鲁迅善待后辈的风范。

据贾植芳先生的弟子对我转述,贾植芳先生一直关注着我的成长,几乎我每发表一篇长文,凡是能找得到,他都要看上一遍。如果有一段时间见不着我的人,又读不着近期我的文章,他必然会关切地向去探望他同时又与我熟识的人询问我的动向。他不仅仅是关切,还经常与我平等地一起探讨问题,特别是学术上的问题及动向。他的作风也影响了不少人。他的弟子们,如苏州大学年届八秩的范伯群教授,复旦大学我的同龄人陈思和教授,也都继承了他的传统和为人之道,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门外汉而鄙视我,而是热情、平等地与我相交相叙、探讨问题。



贾植芳先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不因为官方及传统的既有定论或政治标准作为自己交往的准则,而是看其是否活得像个“人”来加以界定。如对待历史上那个曾与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权作过坚决斗争的中共早期元老级党员、“大托派”郑超麟,他就毫不避讳地与之交往,甚至亲往其寓所探视、叙谈。记得是在 2003 年岁末的一天,我去探望他,谈及因“非典”已耽误了半年多、现即将成行的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一事,我对他说,除代表团已安排的在台正常日程外,我个人唯一的安排,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历史上那个曾受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委托,义不容辞参与营救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冯雪峰的多色彩的“文学自由人”胡秋原先生。他听后,连说“好哇! 好哇! 应当去探望,应当去探望”。又说,有人说他是托派,就因为他坚持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独立的主张。2004 年 2 月 13 日,抵台次日晚,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在了位于台北县新店中央新村五街十一号狭小的胡府客厅里,与年已 94 岁高龄的胡秋原前辈及其 92 岁的夫人胡敬幼如、他的长女、外孙女等一起畅谈了整整 100 分钟。这也是胡秋原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大陆作家、学者的访谈。这次访谈后三个月,5 月 24 日晚,胡秋原先生因年迈器官衰竭救治无效逝世。9 天后,2004 年 6 月 2 日,北京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登了由我撰写的特稿:《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接着,在贾植芳先生的不断鼓励指点下,我开始了新一轮的胡秋原研究,重在他终生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己任的正确立场。同时,对七十多年前因“左联”头面人物奉行的严重关门主义政策,不恰当地对胡秋原先生展开围剿式批判的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激烈论战,进行全方位史料考证的重新认识和界定;在学术领域里首次全面阐述胡秋原先生对鲁迅的心向往之,与鲁迅站在一道,撰文痛斥独夫民贼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媚日投降论调,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以及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文艺论争结束后,鲁迅赠送胡秋原一帧“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语)普列汉诺夫照片,胡秋原不计前嫌,掩护、营救中共要员瞿秋白、冯雪峰的义举。此外,我还对 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442 页中对胡秋原先生极不公正的带有“左”的严重印记的错误注释,向新版《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逐一“投诉”,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认肯,也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

2004 年 5 月,胡秋原先生逝世后,93 岁高龄的胡夫人敬幼如偕众子女



在读了北京《中华读书报》刊发的拙文后,迅速作出了决定:全权委托由我负责《胡秋原传》的大陆出版事宜。此事,经联系,很快便得到了胡秋原家乡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为此,胡夫人偕众子女很快寄来了亲笔签署的委托书,授权由我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全权处理。收到台湾特快专递寄达的授权书后,我特去上海向贾植芳先生面禀,并恳请由他撰写序言。贾植芳先生听后,说这是一件好事。随后,他对我恳请作序一事却报之微微一笑,且笑得很是开怀、慈祥。五年来,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先生,这回却一口予以了拒绝,且不留任何余地。他摇摇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道:“我不写!”困惑中的我问:这是为什么?他爽快地作了回答:我一没有见过胡秋原先生,二没有系统读过他的著作,所以……“那,请谁来写呢?”他又笑了,说道:“你,我看你就行!”我一听,顿时慌了神:“我,不行,不行!”“第一,你已经抢在死神前面和他见过面了,”贾植芳先生给我细细分析上了,“第二,你已经为他公开平了反(指的是《中华读书报》那一整版特稿),第三,你现在完全有能力写好。而别人不了解,是写不好的。”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那睿智、慈祥、亲切的目光,分明是在对我说:秋石,你已经成长起来了,再也不用扶了……

是啊,我细细回味着他的话,继而一想,可不是么,我也已是抵近花甲之人的人了,“大人”们扶着我走过了这难忘的二十多年,现在,难道还要他们再扶着走路吗?……

就这样,我顿时来了勇气,被可敬可爱的前辈大家贾植芳先生硬是活生生撵着吆喝着上了架。这个序的完成,使我又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了多年前贾植芳先生关于“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的提示,对于一个学术研究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现在,修订后的大陆版《胡秋原传》,由笔者担纲撰序作跋,已经出版。

这九年的交往,我从贾植芳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先生一样,做一个“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证词”的严谨学人,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作为误打误撞闯入学术界的“一匹野马”,我忘不了二十多年来那么多的学者、左翼作家对我的厚爱,尤其忘不了贾植芳先生九年中对我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

我将永远记住十年前他为拙著《萧红与萧军》所撰序言中写下的一



段话：

秋石正值盛年，希望以后在两萧研究，包括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中，不断走向深入，拿出更多富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文化品位的新作。

令我同样无法忘怀的是，四年前在其寓所进行的一次长谈中，他老人家对我语重心长的教诲：

秋石，你不是吃官饭的，也不受那些既定的条条框框的约束，更应当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立场。鲁迅研究同样不能例外。

毋庸置疑，贾植芳先生生前对我的这些殷殷嘱告，正是本书整合出版的宗旨所在。

秋石

2009年10月于昆山香樟园

目 录

-
- 代序：鲁迅传人贾植芳 秋 石
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 (001)
 此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特约稿。
 本文理论联系实际，采用众多共和国创建者、革命英烈、抗日爱国将领、社会贤达、鲁迅学生，一度与之对立的论敌和国民党高层人士等各界各色知名人士发自内心对鲁迅的哀悼、中肯评价，全面地、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民族魂的深刻内涵。
于包容中见伟大 (012)
 鲁迅何以谓之伟大？何以成为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心目中的民族魂？
 本文作者赶在死神降临之前，于 2004 年 2 月 13 日在宝岛台湾拜访了当年一度成为鲁迅论敌、后又受到鲁迅鼎力保护的 94 岁老人胡秋原先生.....一个月后，老人于临终前的病榻上辗转向本文作者道出了埋藏在心底深处达七十二年之久的“我永远忘不了鲁迅”的最强音。
伊罗生与鲁迅、茅盾 (017)
 《随笔》杂志发表了徐贲先生题为《红潮往事》的万言文，写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政坛、文坛发生的一些典故。作为土生土长且在自己故土上完大学的华夏子孙，是否因为现在执教于美国大学，就可以洋腔洋味十足地闭塞双眼，仅仅凭藉已故洋人数十年



前的一孔之见，不经任何调查考证，想当然地对自己祖国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说三道四，妄加发挥评述？

针对徐贲这种缺乏必要的治学态度及其“成果”，本文作者运用事实材料反复印证，逐一批驳徐贲错误百出的这篇“学术随笔”。本文提供的一些史料，不少为首次例证：如著名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留存的有关她当年的亲密同事伊罗生是否系“托派”的答案；建国初茅盾屡屡请辞毛泽东提名他担任共和国首任文化部长的内情；以及谁是1962年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的最早提出者……

鲁迅是与人公开谈论过冰心的 (051)

“糖水里泡大的冰心，难以写出深刻的文字”吗？

冰心“偏离了‘五四’进取精神”“存留着相当的‘旧传统’”吗？

“鲁迅从未公开谈论过冰心”吗？“鲁迅对冰心不够友善”存“有隔膜”吗？

针对专门研究“五四”时期作家的陈学勇提出的上述一系列观点，本文作者进行了大量而又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并向南北十余位熟谙那段历史的专家、学者请教及反复印证。可喜的是，作者最终从大量史料特别是当事人留存的资料中寻觅到了当年鲁迅、茅盾对冰心的真实友善态度和准确评价，从而，于根本上还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女性作家和儿童文学大师冰心的清白。

关于《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及其他 (066)

这份“整理稿”是由著名国际友人、享誉世界的新闻双杰和文坛双璧、《西行漫记》一书作者埃德加·斯诺和《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夫妇联袂完成的，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学文化遗产。

这份“整理稿”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其内涵也十分丰富。

但鲁迅是人，不是神，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因之，十分自然的，“整理稿”也存在着一些瑕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鲁迅纪念日，鲁迅生前亲密战友、著名文学大师茅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鲁迅研



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

茅盾先生的话，为我们如何解读这份“整理稿”指明了方向。

“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082)

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富有冒险精神的两位美国青年，远涉重洋先后来到中国，是什么力量最终使他们改变了“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初衷？

来中国后不久，独具慧眼的他们，有幸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于是，一个新的生命轨迹，一条追求理想信念的坎坷之路，便在他们脚下衍生了。而一部《西行漫记》和一部《续西行漫记》，外加一部《活的中国》，则翔实地见证了这对美国青年男女的在华探“宝”史；一篇以鲁迅访谈内容为主的珍贵史料《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见证了一代伟人鲁迅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于是，他们在让世界知道鲁迅和了解中国的同时，由衷的发出了“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的深切感言……

为胡风、丁玲等辩护几句 (099)

为名人作传，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人们尤其需要认真待之的，是那些由名人至爱亲朋执笔撰写而成的传记。一类是严格遵循历史原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说。而另一类则不敢苟同了：有的恣意将自己心仪的名人拔高，有的则在主角或他人的隐私上下工夫，乃至炮制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绯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更甚的，为掩饰家族名人长期挥之不去且屡遭公众非议的严重过错，竟然将谎言引向社会名流乃至一代伟人的身上，抛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但又颇能诱发人们义愤填膺的类新闻“史实”来……有关端木与萧红的传记文本，就是这其中的“范本”。

本文作者经考证、比对大量史料，特别是颇具权威的《周恩来年谱》，鲁迅挚友曹靖华先生的亲述回忆，吴奚如、胡风等相关当事人历史现场的来往信件，王洛宾、丁玲、聂绀弩等文坛名人留存的



文字资料，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作者自结识鲁迅学生萧军与多位左翼作家、历史见证人始，及至投入二萧研究、左翼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所积累的大量资料，逐一批驳了该传记中歪曲、伪造历史真实的低劣行径，还了胡风、丁玲等人的清白和事物本来面目。

从沈醉“良心发现”不杀鲁迅说起 (132)

历史上，蒋介石下达过杀害鲁迅的指令吗？如果蒋介石没有下过类似的指令，那么，又何来沈醉最终“良心发现”终止杀害鲁迅的说法？

沈醉为什么要抛出这个弥天大谎？他的目的安在？

1979年7月20日，国家出版局为什么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售销毁沈醉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

蒋介石为什么会说出“我素来很敬仰”鲁迅的话？他又为什么要安排既为自己亲信又为鲁迅门生的李秉中作说客，一再劝说鲁迅（并提供经费）去日本疗养？在鲁迅逝世十年后，正在紧张还都南京的蒋介石，为什么要在百忙中指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专程飞往北平，给陷于极度贫困中的鲁迅原配夫人朱安送去10万元法币？

本文以包括鲁迅夫人许广平1941年冬亲述在内的大量鲜活史料加以论证，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沈醉“良心发现”不杀鲁迅这一可笑至极的无耻谎言。

冯雪峰是这样逃脱国民党囚牢的 (143)

1927年加入共产党，白区文化战线负责人和“左联”发起者，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著名湖畔诗人，陕北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国统区的首位特派员冯雪峰，当年是如何逃离国民党囚牢的？有关此事，直到新世纪来临，仍有一些迷雾没有解开。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背信弃义的“皖南事变”一个月后的1941年2月26日，正在家乡浙江义乌乡下撰写红军长征小说的冯雪峰，突遭长途奔袭而来的国民党便衣宪兵逮捕，后又被押往上饶集中营。直到其被捕半年后的1941年8月12日，在延安的毛泽东

方才在作家萧军、艾青等人强烈要求下，安排陈云、凯丰向重庆发报，指示南方局周恩来等人展开营救……

相距六十年后的2002年阳春，经过长达两年多锲而不舍的寻踪考查，于京城南沙沟，本文作者终于寻觅到了历史见证人——1941年8月12日在毛泽东窑洞作客的女作家。从其口中，了解到当年发生在毛泽东宴席桌上这一鲜为人知的一幕。这位几十年来著述甚丰的延安老战士，曾将当年毛泽东接受萧军、艾青等人要求，下令实施营救冯雪峰的全过程，写进了她的题为《延安作家生活纪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一文中。而且，在其回忆录的形成过程中，她还向当时健在、同在毛泽东处作客的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著名作家作了印证，并获他们一致认同。相隔整整一个甲子，这位年逾八旬的女作家，记忆犹新地向笔者提供了当年毛泽东宴请他们的菜谱及有关细节……

毛泽东下达营救指令后，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展开营救的？

作为冯雪峰十年前上海文艺自由论辩中的头号“论敌”，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的胡秋原给三战区司令长官拍发的营救电报，起到了作用吗？

2004年2月13日晚21时许，于台湾台北县新店中央新村寓所，行将离别人世的94岁高龄老人胡秋原与92岁高龄的夫人胡敬幼如，在当年参与营救冯雪峰的问题上，又是如何回答本文作者的？

那么，究竟是谁，最终将冯雪峰营救出国民党囚牢的？

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 (170)

1994年1月，台湾《中央日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发表了以歪曲历史真实、攻讦鲁迅及其弟子为主要内容的荒诞长篇“纪实”《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此后不久，北京《作家文摘》和福建《港台信息报》如获至宝地迅速予以转载，在海峡两岸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本文作者历时三月调查考证，运用确凿史料和同多位历史见证人叙述的材料，撰写了此文。此文于《文艺报》刊出后引发强烈反响：



北京《作家文摘》在强大压力下被迫在头版刊发拙文摘要并作出深刻检讨；福建《港台信息报》也全文转载了《文艺报》所刊拙文。

附录(1)：《作家文摘》刊发的《文艺报》拙文之摘要 (189)

附录(2)：《作家文摘》刊发的“自我检讨” (190)

文学不是荒谬 (191)

女诗人王小妮凭空想象以大量荒诞镜头撰写了一部名为《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的书。作者依据史实及与书中关键人物交往叙述的经历，对该书对 20 余位真姓实名左翼作家的胡乱描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晚年沙汀》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203)

《晚年沙汀》并非纯系当事人真实口述记录，而是一件有着明显加工痕迹的二传手作品——以其临时助手张大明先生另撰“日记”出现，不仅延续了沙汀先生及其“国防文学”派们狭隘门户之见，而且还掺杂了不少“实录者”本人的想当然，更是违背了口述者沙汀先生“不要往外讲”的禁令，同时又涉嫌侵害他人隐私及声誉。

本文即系对《晚年沙汀》一文诸多错讹的质疑和辩诬。

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 (214)

谁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首日第一个发言的作家？

著名老作家萧军在延安“自称为鲁迅替身，却恨共产党人”吗？

最终，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评价这位身上有“匪气”，一度要“自由”要“独立”的东北籍作家的？

本文生动地再现了六十多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首日发生的一幕.....

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223)

此文系作者同多位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以及 1942 年 10 月 18 日延安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现场亲历者反复叙谈印证，自行纠正了作者本人以往行文中偏信传主一家之言，未经严谨考证比对造成的错讹，较为全面、完整、准确地还原了历史现场。



雪压青松忆沫南 (242)

黑土地是滋润的，富营养的，她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志士。

萧军从黑土地走出，萧红从黑土地走出，关沫南从黑土地走出。

作为曾长期受他们恩泽、教诲的晚辈作家，我将义无反顾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将昔日东北作家群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献身精神传承下去。

对“国防文学”口号若干问题的再探 (258)

1978年9月11日，老一辈革命家陈云致信中组部长胡耀邦，就有关历史上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诸问题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我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很快，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课题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周扬同志有关马克思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报告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有悖于常理的恣意曲解和粗暴干预，几经周折，落实陈云同志指示的相关课题研究便搁了浅……

本文为贯彻落实施陈云同志三十年前指示而撰写，依据史实及多方考证，力图公正诠释。

附录(1)：(八一宣言) (287)

附录(2)：陈云致胡耀邦信 (292)

让历史回归真实：还文学自由人本来面目 (293)

本文新颖之处：1. 经论证，新版《鲁迅全集》听取了作者意见，部分地缓解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4卷442页的极左注释。2. 首次论证了胡秋原与鲁迅并肩作战反对蒋介石媚日卖国打内战的独裁政策。3. 为胡秋原当年的文学主张正名。

附录 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315)

后记：求是正未有穷期 (319)

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

1937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所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侧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

毛泽东最后指出：“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在 1940 年 1 月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